

比较

2018年
第4辑
总第97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丹尼·罗德里克

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经济学

楼继伟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有关问题

张春霖

国有企业改革再出发

陶然 王瑞民

农村土地改革的制度创新与路径

马克·格兰诺维特

社会结构对经济结果的影响

约翰·沃利斯

美国各级政府财政的长期演变

王振源 李根

韩国的包容性发展战略

张穹

平台竞争的几个重要问题

于立 王玥 杨童

平台模式中的跳单问题

陈永伟

平台竞争与治理

比较

总第97辑

2018年第4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第 97 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
社, 2018.8

ISBN 978-7-5086-9328-6

I. ①比… II. ①吴… III. ①比较经济学 IV.

①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4427 号

比较 · 第九十七辑

主 编: 吴敬琏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328-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马媛媛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总经理 张翔

执行副总经理 张立晖

副总经理 傅继红

发行总监 周广宇

品牌传播部高级总监 马玲

独家代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8610) 85905000 传真：(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8610) 85905101

电邮：ad@caixin.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circ@caixin.com 客服电邮：service@caixin.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8号院三里屯 SOHO 6 号楼5层 (邮编：100027)

卷首语

近日来，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外来的压力和挑战，而如何面对国内的稳增长与去杠杆两难，应对债务违约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以及预期严重不确定下的信心问题，都不容小觑。能否认清国际形势之变化，是否选对了贸易战之对策，更要立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原则，落实现代化国家治理。本辑《比较》围绕新国际形势下的中国改革这一主题，将国内外学者的见解提供给读者。

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看似毫无征兆，但其反冲已出现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罗德里克的文章试图剖析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他指出，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表明，贸易开放会对收入分配带来剧烈影响，总会造成受损者，经济学家对此心知肚明，却没有对公众强调。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它们对美国特定社区的劳动力市场确实有极大的影响，会严重抵消贸易收益。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尤其突出。对受害群体实施补偿则会遇到经济成本与政治可信度问题，难以有效实施。劳动力市场动荡还来自需求冲击、技术进步以及正常竞争等影响因素，然而国际贸易在政治上尤其敏感，除了外国人容易当替罪羊外，还因为它有时涉及“禁忌交易”，会触发公众的不公平感，引起普遍反对。全球化加深了各国内部相互交织的多重社会裂痕，给民粹主义提供了沃土。如果冲击主要是移民和难民问题，煽动族群和文化裂痕的右翼民粹主义将占主导。如果冲击主要是贸易、金融与外国投资，则更多表现为强调收入或阶层差异的左翼民粹主义。美国在两种类型的冲击下，同时兴起了以桑德斯与特朗普为代表的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新的形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实，对“二战”后确立的全球经济制度安排进行调整，特别是实现三个方面的再平衡：从资本和企业到劳工和社会，从全球治理到国家治理，从总体经济增益小的领域到总体经济增益大的领域。罗德里克还强调，世界经济的大多数失败根源于国内治理的失败，因此，“全球治理能做出的最好贡献就是让民族国家更好地运行，而不是削弱或限制它”。

“改革论坛”栏目的三篇文章，分别讨论财政、国企以及土地改革。楼继伟的文章讨论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他看来，事权和支出责任不仅是财政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清晰高效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形

成合理的行政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事权改革问题的症结在于: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各级政府职能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念,“机关化”特征显著。上级政府惯于通过行政命令方式管控下级政府,约束下级政府按上级偏好履行事权,而非由各级政府根据事权属性,通过建立本级的机构队伍,采用“实体化”的方式直接承担相关事权,从而导致政府间权责边界模糊,共同事务泛滥,行政效率偏低。文章从外部性、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三大原则出发,结合国际经验,论述事权划分改革的方向,那就是以“实体化”“法治化”“高阶化”为重点,推动事权划分改革。

张春霖的文章探讨新形势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他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提高,如何实现国家所有制与全球市场经济秩序的兼容,是一个紧迫而艰巨的挑战。面对这一新挑战,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新的起点上再出发。从改革的方向来看,应当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而不是扭曲市场机制。从改革的重点来看,应该围绕合理定位、公平竞争、政企分开、惠及全民展开,其要旨就是政府进一步退出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决策,将之留给相互竞争的市场参与者,包括非国有企业和管国有资本的专业投资机构、经营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政府则以更超脱的定位,专注于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用国有资本的收益来改善民生、调控收入差距,为国有资本的原始所有者带来更实际的利益。如此,则既有助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有助于更好发挥政府职能。

陶然和王瑞民的文章考察了近年来传统农区推动的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与宅基地确权与抵押、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指出既有政策措施由于缺乏良好的顶层设计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们认为,目前的农村土地确权,其直接和间接成本高昂且收益很低,应该建立多类型土地发展权指标交易市场,建立跨区交易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动农区土地整理,从而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实现永久、连片确权。这不仅可以全面完善原有低效率的土地计划指标配置方式,也有助于区域间公平发展。从更长远来看,要最终实现农区土地的高效率配置,应当以地方试点的方式逐步推动农村土地的国有制,结合土地确权登记,赋予农民可交易、可抵押的永久农地使用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农区土地制度的这一改革与城中村、城郊村的土地改革措施相结合,不仅可以为中国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城乡土地市场,也将为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

近年来,经济学家非常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前沿”栏目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格兰诺维特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的文章。他概述了社会学家就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提出的四个

核心原理：规范有助于提高网络密集度；在社会网络不联通的领域，弱关系比强关系能更有效地传播信息；善于利用网络结构的人可以获得策略优势；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相互渗透，也即经济活动具有社会嵌入性。运用这四大原理，格兰诺维特分别探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就业、价格、生产率和创新。在他看来，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就是为了打开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相互作用的黑匣子，揭示社会现象的动力学，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策略就是开展跨学科合作，就像贸易理论鼓励国家间的合作一样。

在“比较之窗”栏目中，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沃利斯回顾了从1790年至1990年美国各级政府财政的长期演变过程，从收入的筹集成本和支出的政治收益角度，将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试图回答三个主要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否因为筹集收入成本的降低，或者是因为开支的收益明显提高；什么力量推动收入和支出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为什么各级政府的债务积累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有增有减。其基本结论是，政府规模的大小遵从政府承担的职能和义务，而不是收入来源的选择；推动收入和支出在各级政府间分配的重要因素是筹集收入的成本，能够以最小成本筹集收入的那级政府就是最为积极的一级政府。

韩国是为数不多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国家。马来亚大学的王振源和韩国首尔大学的李根尝试解读韩国如何在追求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融入其包容性策略，创建了一种激励包容性增长的机制，成功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将韩国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考察这三个阶段的包容性增长，他们发现，早在工业化的预备阶段，韩国就已经实行了一系列包容性措施，如农村贫困政策与新村运动，在推行重工业化政策的同时，减轻工业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在追赶阶段和后追赶阶段，国家、企业与民间团体为争取社会福利和更优质工作环境进行密集谈判，推动韩国谨慎而又系统性地推行教育预算、“人民的股份”、社会保险与安全计划、扶持中小企业等包容性措施，使韩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确立起维护平等社会的原则，从而使经济增长能衍生出劳动者技能提高和收入分配改善的机制。

“改革记忆”栏目是著名经济学家、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对1989年3月在香港召开的“大陆和台湾经济学家座谈会”的纪要。此次座谈会为期四天，台湾方面参加的经济学家有蒋硕杰、于宗先、邹至庄、费景汉、顾应吕、刘遵义等人。这篇纪要着重记述了两岸经济学家对中国大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货膨胀、财政和金融赤字、价格及汇率双轨制、企业制度，以及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对待公平和分配问题进行了讨论。蒋硕杰等学者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要设计者，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非常值得我们重温，以期获得新的启发。

近年来，以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在中国兴起并快速发展，它不仅改变了经济增长和商业竞争的法则，也改变我们每一个

人的生活,更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政策提出了挑战。本辑《比较》特别选取了四篇有关平台经济的文章,为读者理解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提供参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召集人张穹的文章从平台竞争的角度展开分析。他为平台竞争归纳出八个重要的方面:规模、相关市场界定、动态竞争、跨界竞争、生态竞争、差异化竞争、数据竞争和全球竞争。然后,结合这八个方面,从实施竞争政策的角度,讨论在判定平台企业垄断时可能存在的理论难点,由此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方向。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于立等人的文章以“陆勇案”与“数字音乐案”为例,剖析平台模式中的跳单问题。文章运用经济学中的争用性和限用性物品的概念,构建了一个四象限的物品分类框架。根据这一分类框架,平台模式中的知识产权产品就是位于第三象限的共享品,具有零边际成本的特征。这类产品存在两类悲剧:一类是反公地悲剧,一类是准公地悲剧。所谓反公地悲剧,就是对这类产品的专利或产权保护过度,导致无法有效利用这类产品为社会带来福利;所谓准公地悲剧,就是对这类产品的专利或产权保护不利,导致研发和生产投入不足。为了避免这两类“新公地悲剧”的发生,对于知识产权产品应该采取“保反兼顾”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创新程度,分别采用“重保轻反”“保反适度”和“重反轻保”的政策组合。

陈永伟的文章提出了理解平台性质的“二重性”分析框架,认为平台除了作为企业外,同时还具有市场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属性。借助这一分析框架,他对平台的竞争问题和治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分析,认为,在思考以上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认清平台的二重属性,而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思维。此外,应该从成本和收益分析的角度出发,在平台治理和政府管制之间画出边界。

目 录

Contents

第九十七辑

- 1 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经济学 丹尼·罗德里克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by Dani Rodrik*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34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有关问题 楼继伟
On the Reform of Intergovernmental Function Assignment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by Jiwei Lou*
- 49 国有企业改革再出发 张春霖
Re-launch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by Chunlin Zhang*

- 74 农村土地改革的制度创新与路径：以国有制推动土地发展权

交易与使用权流转

陶然 王瑞民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for China's Future Rural Land System: Rural
Land Nation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Transfer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by Ran Tao and Ruimin Wang

前沿

Guide

- 112 社会结构对经济结果的影响

马克·格兰诺维特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by Mark Granovetter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134 美国各级政府财政的长期演变：从1790年至1990年

约翰·沃利斯

American Government Finance in the Long Run: 1790 to 1990

by John J. Wallis

- 156 包容性发展战略：韩国推行阶段式包容性增长的案例

王振源 李根

Projecting the Arena of Inclusion: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in
Pursuing a Phased Inclusive Growth Process

by Chan-Yuan Wong and Keun Lee

改革记忆

Retrospect of Reform

- 188 和台湾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发展与改革问题的纪要

杨启先

Notes of the Workshop with Taiwan's Economis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by Qixian Yang

- 198 平台竞争的几个重要问题

张 穹

Important Issues about Platform Competition

by Qiong Zhang

- 213 平台模式中的跳单问题：以“陆勇案”与“数字音乐案”为例

于 立 王 玥 杨 童

Deal-switching in the Platform Model: Examples of Lu Yong's Case and

Digital Music

by Li Yu, Yue Wang and Tong Yang

- 230 平台竞争与治理：二重性的视角

陈永伟

Platform Competition and Platform Governance : A Dual Perspective

by Yongwei Chen

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经济学

丹尼·罗德里克

引言

民粹主义是一个包含各种运动的宽泛标签。该术语起源于 19 世纪后期，当时美国的农民、工人和矿主组成联盟，反抗金本位制以及东北部的银行和金融集团。拉丁美洲悠久的民粹主义传统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贝隆主义（Peronism）为代表。今天的民粹主义囊括了广泛的政治运动，从欧洲的反欧元、反移民党派，到希腊的极左翼联盟党（Syriza）和西班牙的左翼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美国特朗普的反贸易本土主义，拉丁美洲的查韦斯经济民粹主义，以及立场夹杂其间的其他许多派别。他们的共同点是以

* Dani Rodrik,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候任会长。他的新书 *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Princeton, 2017，中文版将由《比较》编辑室编辑出版）。原文见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June 2018, Volume 1, Issue 1–2, pp. 12–33。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附录，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 作者感谢 Michael-David Mangini 和 Christine Gosioco 提供的研究协助，感谢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提供的研究支持，以及如下人士的评论和对话：Pol Antràs、Bart Bonikowski、Jeff Frankel、Jeffrey Frieden、Peter Hall 和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Sarianna Lundan 和一位匿名评审人给予的编辑建议帮助改进了本文。

反建制 (antiestablishment) 作为出发点, 自称替民众发声反对精英, 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全球化, 并经常 (但并不总是) 带有威权主义统治的倾向。^①

本文将论述两个问题: 第一, 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是什么; 第二, 什么因素影响了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民粹主义的兴起看似毫无征兆, 但其反冲已出现了至少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 (参见图 1)。更重要的是, 这种反冲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本文将着重探讨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 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并不认为全球化是唯一的作用因素, 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因素。技术变革, 赢家通吃的市场模式兴起, 劳动力市场保障弱化以及制约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被削弱, 都发挥了影响。这些变化与全球化有相互促进作用, 不完全独立于全球化, 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全球化。然而经济史和经济理论都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表明全球化的高级阶段很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反冲, 后文将对此详加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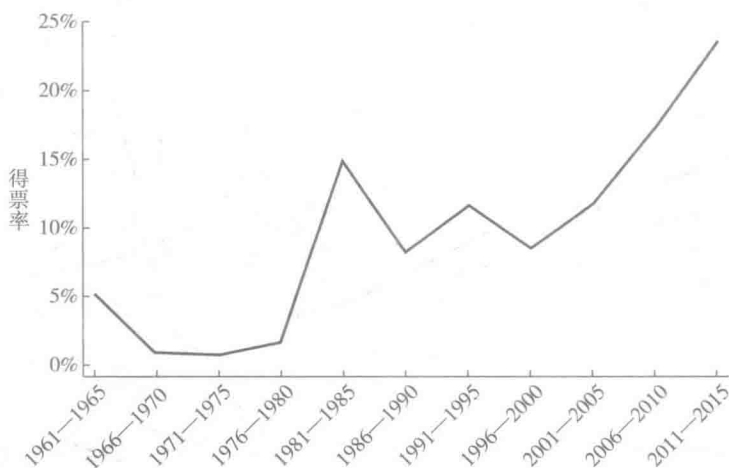


图 1 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 (至少有一个民粹主义政党的国家, 其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

民粹主义的反冲是可以预见的, 但其具体形式更难判断。民粹主义有不同的版本, 本文将它区分为左翼和右翼, 区分的依据是民粹主义政客强调并设法

^① 对民粹主义不同定义的描述, 可参见 Kazin (1998)、Judis (2016)、Müller (2016)、Mudde and Kaltwasser (2017)。

引起大众瞩目的不同社会裂痕（另参见 Judis, 2016）。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和拉丁美洲大多数民粹主义表现为左翼，而特朗普和当今欧洲的民粹主义（少数例外）表现为右翼。下文将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反全球化的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具体是因何种缘由兴起的。

我认为，对全球化的不同反应与社会感受全球化冲击的形式有关。如果全球化冲击主要表现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民粹主义政客就更容易通过族群和文化裂痕动员民众。欧洲发达国家的情况大体如此。反之，如果全球化冲击主要表现在贸易、金融与外国投资等方面，则更容易利用收入或社会阶层差异动员民众。这正是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在美国，以上两种类型的冲击在近期都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同时催生了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伯尼·桑德斯与唐纳德·特朗普。

我认为，还有必要区分民粹主义兴起的供给和需求。全球化加剧了经济焦虑感和收入分配的争夺，培育了民粹主义的需求基础，但并不必然决定其政治倾向。现有社会裂痕的相对特征以及民粹主义领袖的论述，才给人们的不满提供了方向和理由。如果忽略其中的差异，将难以分辨驱动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多种经济和文化因素各自的作用。

本文的框架如下：首先讨论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对贸易自由化的分配效应所做的分析（贸易和再分配）；据此，对损失补偿问题展开经济学和政治学讨论（补偿与安全网）；接下来探讨公平与收入分配正当性的问题，经济学家普遍回避此类问题，但它们是理解民粹主义反冲现象的关键（贸易、再分配和公平）；金融全球化的危险这一节回顾了金融全球化的后果；民粹主义反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一节从供给侧探讨民粹主义，并讨论有关各类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不同条件；最后一节为总结评论。

贸易和再分配

为什么全球化的各种形式会带来政治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何随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商业周期的状态及其他因素而变化？从颇具争议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看，“二战”后的繁荣是如何实现的？当前的民粹主义反冲与之前有哪些相似点或不同点？

对任何熟悉贸易和金融一体化基本经济原理的人来说，全球化的政治纷争特质应该并不意外。国际经济学家采用的主要模型往往带有强烈的再分配含义。事实上，世界经济在最近几十年能实现如此高的开放度并维持如此长的时

间,反倒是真正待解的谜题,后文还将对此加以探讨。

首先来看贸易理论。有关贸易和分配的理论模型本质上在追踪价格变化如何影响各经济利益群体的物质福利。作为经济学理论中最杰出的定理之一,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1941)表明,贸易开放会对收入分配带来剧烈影响。具体而言,在两产品两要素模型中,如果要素具有完全的跨部门流动性,则其中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必然会因为贸易开放而受损。被密集用于生产可进口产品的要素,其实际收入必然下降。请注意,该定理指的是绝对损失,而非相对损失。还有,此结论与消费偏好无关,即使某个群体把大部分乃至全部收入用于可进口产品(其相对价格下降),他们的利益依然会受损,只是损失幅度有所减少。将此原理大致应用于今天的美国经济,意味着低技能工人毫无疑问会因为贸易全球化而受损。

原始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是在极特殊的条件下推导出来的,有时人们认为,更复杂、更现实的模型会弱化上述惊人的结论。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依然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类似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结论,可以表述如下:在竞争条件下,只要可进口产品继续在国内生产,也即排除完全专业化分工的情形,则总是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会因贸易自由化受损。换句话说,贸易总会造成受损者。

该结论的证明非常简单,可以简要描述如下。假设在实行自由化的可进口部门中,单位生产成本为: $c = \varphi(w_1, w_2, \dots, w_n)$,其中 w_i 代表该部门中使用的第 i 种要素的回报。由于所有要素的回报之和等于生产成本,则单位成本的变化等于各要素的回报变化的加权平均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权重是各要素在成本中所占的份额,^①可以表述为: $\hat{c} = \sum \theta_i \hat{w}_i$,其中 $\hat{}$ 代表比例的变化, θ_i 是要素 i 在成本中所占的份额, $\sum \theta_i = 1$ 。

下面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贸易自由化使可出口产品相对于可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提高,以上述可进口产品为基准产品,每单位的价格固定。我们要关注的是可进口产品使用的各要素的回报将有何变化。由于以该产品作为基准,则均衡条件为: $c = \varphi(w_1, w_2, \dots, w_n) = 1$,意味着产品价格等于单位成本(满足零利润的条件)。只要该产品的生产持续下去,上述均衡条件在贸易自由

① 这一理论模型可以通过引入生产要素摩擦,把所有剩余消除,使技术转为不变回报,以满足收益递减特征。收益递增的情形会更复杂,与完全竞争并不兼容。

化前后都应该得到满足，由此得到： $\sum \theta_i \hat{w}_i = 0$ 。既然要素价格变化的加权总和为零，则必然有至少一种生产要素（设定为第 k 种要素），满足： $\hat{w}_k \leq 0$ 。当不同产品的要素使用密集度不同时，该要素的回报变化将严格小于零。与此同时，可出口产品的价格将因为自由化而提高（ $\hat{p} > 0$ ）。由于 $\hat{w}_k \leq 0 < \hat{p}$ ，要素 k 的回报在可进口产品和可出口产品中都会下降，导致其实际回报毫无疑问地降低，而与两种产品在支出预算中所占的份额无关。

这就是贸易理论中的所谓放大效应（magnification effect），它来自如下事实：在新古典均衡中，要素价格的变化必然包含在产品价格的变化之中。因此，放大效应具有普遍性。贸易开放会造成利益受损者，这不是特殊案例，而是一大类理论模型的结论，包括劳动力不容易实现跨产业和跨地区流动的模型。

利益得失的具体分布则取决于模型细节。在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两部门两产品情形中， $\hat{w}_l < 0 < p < \hat{w}_h$ ，其中， w_l 和 w_h 分别代表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的回报。贸易理论的另一个基准模型是专用要素模型（specific-factors model），在该模型中，每种产品对应一种只用于该产品的要素，此时受损的将是可进口部门的专用要素。

更近期的贸易理论研究强调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异质性。这类模型加入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再分配。例如，有的研究（Grossman et al., 2017）通过不同类型员工的异质性，丰富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模型。“经理”和“员工”必须组成团队，其生产率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匹配状况。贸易自由化除了对生产要素和行业带来广泛影响外，还将导致团队的重新匹配，对不同职业和产业的分配状况造成影响。

因此在所有这些模型中，再分配成为贸易收益的对立面。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这是标准的经济代价，所有贸易经济学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没有对公众过于强调而已。

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个没有得到重视但与本文讨论密切相关的含义。相对来说，贸易壁垒越小，贸易自由化的再分配效应就越大，甚至可能吞噬全部净收益。换句话说，随着自由化逐渐降低贸易壁垒，再分配效应与净贸易收益的比例会提高。^①

①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称之为自由化的政治成本收益比（political cost-benefit ratio, PCBR），并进行了一些有意思的测算（Rodrik, 1994）。

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先看该比例的分母部分，在公共财政中，有一个标准的结论，即税收的效率成本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由于进口关税是对进口产品征税，关税也适用上述原理。低关税产生的扭曲效应较小，而高关税有极大的负面效应。相应地，随着贸易壁垒降低，贸易自由化的效率收益将逐渐减小。

另一方面，再分配效应基本上同价格变化保持线性关系，而与贸易壁垒的边际水平无关。用一阶近似来说，进口价格下降 10% 的效应相当于要素价格下降 5% 的效应的两倍。把上述两个事实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得出结论：随着贸易壁垒降低，每单位效率收益对应的受害人群的损失会提高。

表 1 给出了利用简单的两要素两产品贸易模型的量化模拟结果：当关税为 40% 时，损失与净收益的比例约为 5；当关税为 3% 时，该比例迅速提升到 70 以上！

表 1 贸易自由化的分配和效率结果

削减的初始 关税水平 (%)	低技能工资的 变化 (A, %)	经济体实际收入的 增长 (B, %)	A 与 B 绝对值 之比 (A/B)
40	-19.44	4.00	4.9
30	-15.22	2.55	6.8
20	-10.61	1.00	10.6
10	-5.56	0.25	22.2
5	-2.85	0.06	45.5
3	-1.72	0.02	76.6

当然，每单位效率收益所对应的受益者的收益也会相应提高。但关键之处在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是残余的低贸易壁垒，此时的贸易协定将更多涉及再分配问题，而非扩大经济总量。这或许是全球化在高级阶段变得更具政治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① 如果全球化除了产生传统贸易理论强调的静态效应外，还会有动态效应，那么贸易的净效率收益就有可能被放大。由此带来的增长效应通常会使再分配结果不那么显著。但是，这并不那么正确，因为内生增长模型对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例如，当一国在动态变化的行业中拥有（静态）比较优势时，增长效应最终可能是负面的。换言之，动态效应并不会放大贸易收益。它们只是产生了绝对意义上的放大效应，既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